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英剑教授

ChatGPT: “堵”还是“疏”，这是个问题

■郭英剑

作为全新的人工智能(AI)语言模型, ChatGPT 诞生于2022年11月30日。目前, 虽然其尚处于试运行阶段, 但已经产生了极为震撼的影响。对此, 我已在本专栏发表文章《ChatGPT 冲击波已来, 高等教育应做好准备》(2023年1月10日第3版), 探讨了其对全球高等教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1月28日, 美国“内幕”网站发表文章称, “ChatGPT 才出现两个月, 就已造成了难以言喻的混乱。”

虽然 ChatGPT 诞生于去年, 却有媒体把2023年视为 ChatGPT 元年。在我看来, 这主要想说明, 2023年将是人们不得不面对 ChatGPT 所引发混乱的一年。

ChatGPT 带来的惊喜与焦虑

自诞生伊始, ChatGPT 便受到了人们的狂热关注, 各国注册者众多, 但往往被告知“现在已经满负荷运转”而无法注册。

历经月余, 我终于在不久前注册成功, 随后亲历的一些试验结果既令人惊喜和赞叹, 也让我与诸多教育工作者一样感到担忧。

我的一个体验是——用英文发出指令, “请写一首包含白雪与树林的(英文)诗歌”。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ChatGPT 就给出了一首近乎完美的英文诗歌。我将其在朋友圈发布后, 有许多英文系教授都深感惊喜, 并赞叹“水平相当高! 写得极好! 太神奇了!”

当然, ChatGPT 的功能远不止于此。据“内幕”报告称, 研究人员最近让 ChatGPT 通过了美国一项极其艰难的考试——美国医疗执照考试。该考试由三部分组成, 报告称, ChatGPT “在没有任何培训或强化的情况下, 所有三项考试成绩均达到或接近通过门槛”。这一成绩自然得到人们的称赞。

然而在称赞背后, 人们应该看到 ChatGPT 之于学术界的焦虑与恐慌。

事实上, 在 ChatGPT 刚刚问世不久, 很多人就感受到它给写作带来的巨大威胁。以《大西洋月刊》为例, 它在 ChatGPT 诞生不到10天, 便连续发表两篇颇有耸人听闻的文章, 一篇题为《大学中的论文已死》, 一篇题为《高中英语的终结》。

将两篇文章对照看, 不难发现其所论述的是一回事儿, 即从中学到大学, 人们在语文教育与通识教育中一直训练学生掌握的写作本领已经走入死胡同。正如《大学中的论文已死》中所说, 高校中的论文, 尤其是本科生论文, 长期作为人文教育的核心, 是我们教育学生如何研究、思考和写作的方式。但是, 人工智能的出现造成了整个传统即将被彻底颠覆的现象。

应用型高等教育应向工业技术文化转型

■陈洪捷

在当前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中, 产教融合一直是一个核心政策议题。

2022年底, 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 提出坚持以教促产, 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此前的2019年10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提出要建设2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产教融合正在成为教育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

所谓产教融合, 即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注意的是, 这并非新概念, 相关政策方针早已有之, 而且还在不断被强调。这也说明了教育与产业、人才培养与经济生产在现实中似乎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而且总有一种相互脱离的惯性。

正如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所指出的, “受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影响, 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相适应, ‘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

我们不禁要问: 产教融合为何一直在推, 却一直难以真正被落实? 产与教的融合究竟难在哪里?

现代高等教育共存两种文化

众所周知, 教育和产业是两个不同的社会体系, 无论是目标、管理, 还是运行方式、价值追求, 两者均不相同。其差异不仅来自体制和机制, 也根植于文化——两个不同的体系均有各自文化, 而文化意味着观念、信念以及指导人们行为的价值体系。

具体而言, 在高等教育领域, 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学术文化, 而在产业界, 工业技术文化则是主流文化。

所谓工业技术文化, 是指基于工业生产和技术而形成的文化, 是服从于工业生产和技术逻辑的文化, 其核心价值在于支撑和促进工业生产及全产业链条的运行。现代社会是工业化社会, 扎根于工业生产和技术的工业技术文化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 为工业生产和技术发展提供了观念上的基础,

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 但随着其进入高等教育, 如何使其成为以学生为中心的使用工具? 高校是否会采用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 现在关注的是如何合乎道德且高效地应用人工智能, 改善学生的体验。



《大学中的论文已死》一文还引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副教授凯文·布莱恩的话——他对 ChatGPT 的表现深感震惊, 认为如此一来, 自己就无法再给学生布置课外作业了。

事实上, 构建语言技术的工程师和语言教育工作者都没有为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及其后果做好准备。

学术界仓促应战

虽然几年前人们已经在谈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但当 ChatGPT 如海啸般迎面砸来时, 学术界基本上还是属于仓促应战。目前看, 最主要的应对措施就是政策封堵、禁止使用或限制性使用。

由于学校中已经出现学生使用 AI 生成的内容冒充个人作业, 而人工智能造成的剽窃行为在当下的学术规则中很难得到证明, 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在内的诸多教育部门均出台政策, 禁止在学校使用 ChatGPT。

当然, 学术界受到的影响更大。1月26日, 《科学》主编索普以社论的形式发表题为《ChatGPT 很好玩, 但不能成为作者》的文章, 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ChatGPT 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轰动, 且对科学界和学术界造成严重影响。

ChatGPT 对撰写科学论文所带来的影响很令人担忧。他说, 人们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有大量由 ChatGPT 创建的论文摘要被提交给学术审稿人, 但被发现比例不超过63%。他预计, 今后这种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将会更多。

索普强调, 多年来, 《科学》系列期刊的作者会签署一份许可证, 证明“该作品是原创的”。对于该刊来说, 这足以表明 ChatGPT 所编写的文本是不可接受的——毕竟它是从 ChatGPT 中抄袭而来。

索普说, 我们现在正在更新编辑规则, 强调不能在作品中使用由 ChatGPT (或任何其他

他人人工智能工具) 所生成的文本, 数字、图像或图形也不行。他特别强调, 人工智能程序不能成为作者。如有违反, 将构成科学不端行为, 这与篡改图像或抄袭无异。

在《科学》发表社论的前两天, 《自然》也发表文章指出 ChatGPT 等工具威胁着科学的透明度, 进而宣告该刊使用它们的基本规则, 即任何人工智能工具都不会被接受为研究论文的署名作者, 因为任何作者都承担着对所发表作品的责任, 而人工智能工具无法做到这点。文章同时指出, 如果研究人员使用了有关程序, 应该在方法或致谢部分加以说明。

高校被迫修改反剽窃条例

相比科学界, 高校受到的影响更大。

1月22日,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每日斯坦福》发表文章称, 根据该报进行的一项非正式民意调查, 有大量学生已经在期末考试中使用了 ChatGPT。1月28日, 《福布斯》发表文章称, “89%的学生承认使用 ChatGPT 做家庭作业, 教育工作者正在与剽窃作斗争”。

若想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不妨来看看《福布斯》对学生所做的详细调查。其中, 48%的学生承认使用 ChatGPT 进行家庭测试或测验。53%的学生用它写了一篇论文, 22%的学生用它写了一篇论文的大纲。72%的大学生认为 ChatGPT 应在他们的大学网络中被禁用。同时, 在对 ChatGPT 有所了解的大学教授中, 有72%的教授担心其用于作弊; 超过1/3的教育工作者认为, ChatGPT 应该在学校尤其是大学中被禁止, 而66%的人支持学生使用它。

学生之所以对此趋之若鹜, 实在是因为 ChatGPT 的功能过于强大。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MBA 教授泰维奇的说法, ChatGPT 在常青

然而,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主要是应用型教育得到提升的过程, 即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动下, 大量传统上属于中等教育层次的技术和职业性教育机构纷纷升格进入高等教育体系。这些学校也自然具有了追求“学术化”的冲动, 自觉向传统大学看齐, 并与职业实践渐行渐远。

换言之,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 那些本来遵循工业技术文化的教育机构, 实际上试图摆脱原有文化的影响, 努力

贴近学术文化。

职业和应用型高校虽然进入高等教育系统, 并努力接受学术文化, 但它们在一体系中仍无法与传统大学比肩, 并常常被视为“二等”高教机构。同时, 它们又由于追求学术化而与职业实践及企业需求拉开了距离。这种“不上不下”的地位正是此类高校的尴尬之处。

此外, 由于这类高校数量庞大, 它们这种脱离工业技术文化的趋势也或多或少加剧了高等教育体系与工业生产体系间的文化冲突。

应用型高校应强化工业技术文化

在我国, “产”“教”两个系统间在文化上的差异, 是理解“产”与“教”难以融合的关键所在。关于产教融合的种种努力如果仅集中在制度和组织层面, 难免失之浅表。没有文化方面的举措和变化, 产教融合就缺乏基础。而文化上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需有长远谋划。当然, 文化的改变也必须与制度上的举措相配合。

在此, 笔者提出两个建议, 或许有助于

藤联盟 MBA 级别的运营管理考试中的表现能获得“B 或 B-”的成绩。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犹他州韦伯州立大学的一位教授要求 ChatGPT 用他的声音写一条推文。几分钟内, 该程序发出了十几条消息。这位教授对此的反应是, “天哪!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弊工具。”

由此, 是否禁止 ChatGPT 真的成了人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当然, 更多教师在思考该如何在自己的课程、学习指南中去部署阻止作弊的策略, 并确保学生学会独立思考。

美国一些高校已经将新技术纳入其学术诚信中。华盛顿大学和佛蒙特大学等已经修改了它们的学术诚信策略, 将使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工具纳入剽窃等学术不端范围。

能否拓展使用

当然, 也有一些教师对 ChatGPT 的出现与发展持更积极的态度。

据报道,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副教授莫里克鼓励自己的学生使用 ChatGPT。在他看来, “我们已经身处人工智能的世界, 那就让我们分享人工智能的成果吧”。

需要注意的是, 莫里克在接受采访时说: “即使我不要求(他们使用 ChatGPT), 也可能无法阻止他们(去使用)。”这其中的无奈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莫里克也承认, 对于人工智能如何改变课堂评估, 自己同样焦虑, 但他认为教育工作者要与时俱进。他强调, 当年高校曾经教学生如何在有一个计算器的世界里做数学, 现在高校面临的挑战是要让学生意识到, 世界再次发生变化, 我们要教会他们怎样适应这种变化。

赞同者中, 有人持一个有趣的观点——目前专门校订英语写作中语法问题的人工智能程序 Grammarly 早已出现, 既然人们可以使用它修改自己的语法、语汇等, 为什么不能将 ChatGPT 视为此类程序的一种扩展呢?

值得注意的是, 近日, 《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发布公告, 该报将与大学创新联盟主办网络会议, 讨论“用于学生的人工智能工具”。

该报指出, 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 但随着其进入高等教育, 如何使其成为以学生为中心的使用工具? 高校是否会采用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 现在关注的是如何合乎道德且高效地应用人工智能, 改善学生的体验。希望教育领域、学术界和技术专家在此次会议上围绕高教机构如何从人工智能中受益展开讨论。

对此,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应用型高等教育文化的转向。

首先, 我们一直提倡高等教育要分类发展, 但在当下的高等教育系统中, 应用型高校是很难定位的, 学术类和应用型高校并没有严格分开。如上所述, 由于学术文化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所以应用型高等教育一直在追求学术性和学术化。在这种学术文化的驱动下, 应用型高校很难真正定位于应用性和职业性。

因此, 应该从制度上消除应用型高校进入学术型高校系列的可能性, 并对前者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给予政策倾斜, 引导应用型高校在坚持自身定位基础上致力于高质量发展, 从而使其能定下心来, 踏踏实实做好应用型型和专业型领域的培养, 让它们更主动贴近职业实践领域, 接受工业技术文化。

换言之, 只有这些高校与企业 and 职业实践共享一种文化——工业技术文化, 同时排除学术文化的影响, 二者才能真正融合起来。其次, 为了更好地强化工业技术文化的影响, 可以让产业和行业更多介入应用型和职业型教育领域, 深度参与其培养目标和课程制定, 参与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

在现有部门的管理框架下, 教育和产业主管部门间的沟通和协调仍有不够顺畅之处。如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部门管辖界限, 让产业主管部门深度参与应用型教育, 产教双方在文化上就会日益接近, 更好地相互融合。产业主管部门的介入有利于扩大工业技术文化的影响, 也有利于拉近产教之间的文化距离。

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 工业技术文化居主流文化地位, 会辐射到其他社会领域, 特别是教育领域。如果教育, 特别是应用型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以学术文化为最高追求, 便很难履行其应有功能, 实现其服务经济和工业生产的目标。

也就是说, 在大众化高等教育系统内部, 应当促成一种双元的文化结构, 让学术文化和工业技术文化在其中并行不悖, 各自有其发展空间, 让学术文化主导学术型高等教育, 让工业技术文化主导应用型高等教育。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中国大学评论



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日前, 西南大学一博士研究生在网上反映, 该校法学院教授赵某利用导师职权, 胁迫其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长达三年, 并要求其随叫随到, 否则就不对其学业进行指导。

前几天, 西南大学就赵某因存在严重师德师风问题被处分发布情况说明后, 网友的议论几乎一边倒地指向高校教师, 情节的延伸、事件的推演、负面的联想和举一反三的揣测, 可谓应有尽有。这种举动姑且称之为“扒背面”。

一般来说, 人有公共性的为人知的一面, 也有私人性的不为人知的一面, 如果前者是“正面”, 后者就是“背面”。“扒背面”指的便是专拣私人性的负面行为说事儿, 完全不顾同一个人的公共性一面。从心理学上看, 这是一种不健康心理的表现; 从社会学上看, 它也是不正常的社会倾向之一。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扒背面”会在很长一个时期存在下去。

正因为担心被“扒背面”影响学校的公众形象, 一些高校选择将演化成“公共事件”的处理决定秘而不宣, 以为这样就可以偃旗息鼓, 减少负面影响。殊不知, 类似做法不仅不符合公共事件处理的公正原则, 相反, 神秘化更容易引发人们的猜測, 也更容易被网友“扒背面”。由此看来, 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 给社会一个正式、明确的交代才是最大程度避免被“扒背面”的有效手段。

就逻辑上看, “扒背面”本身是存在悖论的。除非有私人恩怨, 公共领域里的“扒背面”都是对被“扒”对象有所期待才产生的行为。也就是说, “扒背面”并非出于鄙视, 恰恰相反, 它是仰视的结果。网络上频现的“扒”大学教师的“背面”也不例外。

然而, 从上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大众化后, 大学教师的状态和构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能否满足“仰视”的条件也已经很成问题。

过去, 人们关注较多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学生素质的影响。因为从“精英选拔”转向“大众共享”, 付出的代价就是生源质量的普遍下降和学生学习能力、知识基础的参差不齐。这也是高校内外最容易感知到的变化。

让许多校外人士难以感知到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对教师素质的影响。事实上, 高等教育大众化后, 进入高校的学生不再是原来的诗人和性情, 而行为会反过来影响教师, 其结果就是让后者变成了自己能够接受的角色。

由于高校学生数量的增多, 教师的需求量也随之增长, 大量招聘进校的教师虽均拥有“博士学位”的证书, 但今“博”已非昔“博”, 他们身处整个高校向大众化转型的门槛上, 大众化的标准已经印刻在行为中。

从气质和取向上说, 以前大学教师中的“书生”居多, 纯粹、本分, 多讲奉献。但如今, 纯粹的“书生”依然栖居在大学里, 却未必有原来的诗性和性情, 而鱼得水者则不再纯粹, 并且视“本分”为落伍, 以识实务的逐利和添加“斜杠”为尚。

一些西方教育家把学校视作社会, 是希望通过模拟, 在实际交往中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但“大众化”后的国内高校直接成了社会的一分子。在此情况下, 教师很难再以“象牙塔”或“诗意生存”为荣, 而是更多地朝向社会, 汲汲于追赶社会潮流。

因为这一高校大众化转型后的现实是非亲身经历过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变化者所不能察觉的, 这就形成了一个判断、理解上的错位——

一方面是网友对教师的“精英”式期待, 将大学教师视为纯粹、本分的“书生”, 以无私奉献与否进行衡量。这种期待又很容易被极端化为没有“背面”的“圣人期待”; 另一方面, 高校教师的构成已然变化, 他们不再是书生式“精英”, 而成了社会大众的一员, 其中的矛盾直接导致了“扒背面”现象的出现, 但过多的“扒背面”却未必有助于教师的成长。

从现实看, 高校教师在学校中只是扮演着自己的职业角色, 也就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展示自己的长处和最为职业的一面, 并尽可能地在这种职业态度、职业行为和职业道德贯彻始终。换言之, 放大“正面”的自我, 抑制或者缩小“背面”的自我是教师的基本行为准则。

当然, 教师即便作为社会的普通一员, 如网友般不再具备被“扒”的条件, 他们依然是可以被批评的, 那些触犯法律、触及教师行为规范和道德底线者更应受到惩处。赵某的行为之所以应被处分, 就在于其为满足自身私欲, 利用了大学教师的职业身份, 并违反了起码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规范。

中国的教师, 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开始就自认为“君子”, 但经过“大众化”以后, 教师职业与这个传统角色已经渐行渐远。因此, 用比“君子标准”更高的“圣人标准”拷问或检验, 进而执着于“扒”教师的“背面”, 也暴露出“扒背面”者自身的狭隘和单一。

更重要的是, 这种行为主要是建立在机械性的道德说教之上的。而无论是狭隘、单一, 还是抽离现实、机械性的道德说教, 都无益于中国大学的进步和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

『扒背面』与大学教师的职业角色